



水務署為紀念船灣淡水湖、樂安排海水化淡廠及萬宜水庫的建成而出版的特刊。香港本地的幾項大型供水基建項目在建成之時均屬世界級的水務工程，它們的落成被殖民政府視為香港供水史的里程碑，因此對之大書特書，以向公眾展示它解決香港缺水困局、有效治港的成就。後來，隨著時間推移，曾經在香港社會中備受關注的本地供水基建都漸漸被社會遺忘。香港人為何如此健忘？



德國柏林的輸水管，突出於地面，塗上粉綠、粉紅等顏色，在城市景觀中顯眼而突兀。柏林建於沼澤地上，地下水位高，建築工程開展前，要先用水管排走地下水，因此水管要如此安裝。柏林的水管為市民和遊人所關注。香港的水務設施關乎港人的日常生活和福祉，卻一直被遺忘。筆者攝於德國柏林。



主教山前深水埗配水庫，20世紀初英國愛德華時代建成，其清拆計劃於2020年被傳媒曝光。它的古羅馬拱門建築風格為市民所讚嘆，因而興起短暫的保育熱潮。及後政府表示可保育配水庫，供香港市民欣賞遊玩。2021年，古物諮詢委員會把前深水埗配水庫及油麻地配水庫列為一級歷史建築，政府並於同年12月開始開放予市民參觀遊覽。相片中露天處是2020年拆卸工程造成，政府以鋼架加固其結構。廢棄的水務建設被關注，現在仍在運行的本地水務基建卻被遺忘，為何會如此？



沿粉錦公路而建，穿過雙魚河及蕉徑、打石湖等香港重要農業區的東江水管。我們該如何思考香港的供水建設與農業發展？

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具有版權的資料

# 政治地理學的理論視野

### 殖民和後殖民研究：思考香港問題的開端？

約於1970、1980年代，馬克思理論左翼傳統成為理解殖民者和被殖民者之間權力關係的主流理論框架。這種馬克思的理論視野指出，不斷征服非資本主義領土以獲取原材料、從事農業生產或再投資剩餘資本，是西方資本主義體系發展的必由之路 (Glassman 2006: 613)。這個理論的分析焦點，是殖民者以武力征服為手段，不單掠奪被殖民者的土地，更把他們從自主的生產者改造為資本主義下的工資勞動者 (wage laborers)。這過程是資本主義在其侵佔的地方實現原始資本累積，和創建新工人階級的重要一步 (Harvey 2003; Glassman 2006: 610; Frederiksen 2014: 1275)。在這理論視野中，殖民者與被殖民者實力懸殊，殖民者高高在上，被殖民者無從挑戰他們的權威，只有被壓迫、剝削的份兒。

其後，有學者重新審視殖民地語境中的國家 (state) 概念，並認為國家不是馬克思理論傳統所指的，是資產階級的代理人，代表資本家利益，壓迫工人階級；反之，此學派認為，國家無非是一個由眾多個人和團體組成的龐大機構，它沒有統一的意志，眾多持份者各有不同的目標以及策略，並與它所管治的社會建立起多樣化的聯繫 (Jessop 1977)。這派論者拒絕如左翼理論立場般，把殖民地中的殖民者與被殖民者之間的權力關係視為零和博弈。相反，他們更側重分析殖民主義中的國家與社

會互動過程中的動態，不但聚焦於殖民政權掠奪殖民地剩餘價值的策略，也關注到殖民者與土著社群就土地擁有權和使用權所展開的鬥爭模式 (Berry 1992)。

近年來，部分殖民與後殖民研究者探討殖民地的權力現象時，不再把眼光局限於武力的脅迫和經濟領域的爭奪。這新興的理論觀點受法國哲學家傅柯 (Michel Foucault) 的學術理論影響，認為文化是構築殖民地的權力關係的要素，它甚至是殖民主義的內在本質。此理解包含兩個重要觀點：其一，殖民地文化中的一些組成部分，例如由殖民者所創建的意義系統 (system of signification) 和文化的「再現」(representation)，往往形塑著被殖民者的思想和觀念，是殖民者賴以維持社會秩序、並使其統治獲得正當性的基礎所在 (Harris 2004: 165)。其二，由殖民者建立的殖民文化，更往往會延續至殖民統治結束以後，作為殖民遺產繼續存在於眾多的前殖民地中，並對它們的未來產生深遠影響 (Harris 2004: 165)。由是，這些論者都主張要深刻反思、審視、再而清理殖民者以其權力為殖民地社會訂立的種種行為準則、生活方式，甚至階級、族群區隔的規則等 (Frederiksen 2014: 1275)，以在殖民統治結束後達致真正的去殖民化 (decolonization，或稱解殖)。

以此殖民文化的論說為基礎，另一新近提出的觀點借用傅柯的「治理術」(governmentality) 概念，分析殖民政府如何一邊在殖民地推動激進的社會變革，以獲取種種利益，同時又成功維持當地的社會秩序，使其殖民統治持續有效。這些論著特別關注殖民者的統治理性 (rationalities of governance)、規訓技藝 (disciplinary technologies) 和它形塑殖民地主體的策略 (construction of subjectivity) 等方面 (Scott 1995; Mamdani 1996; Airriess 2005; Frederiksen 2014; Chan and Miller 2015)。

殖民及後殖民研究文獻為人們理解殖民地處境中的權力行使，以及殖民者對被殖民者的治理、實現經濟目標等，都提供了有價值的見解。然而，這些論說的不足也是明顯的。首先，即使它們對掠奪性殖民經濟 (extractive colonial economy) 中的統治模式做了廣泛且深入的研究，它們仍未能更完整呈現殖民主義的不同面貌，尤其忽略了非掠奪性殖民地

(non-extractive colony) 之中的權力動態。殖民主義形式多樣，但長年以來比較殖民研究的主要研究對象較集中於以天然和農業資源開採為主的、在英國治下的掠奪性殖民地，如印度以及撒哈拉以南非洲殖民地。由於殖民及後殖民研究賴以立論的基礎是掠奪性殖民地的個案，他們發展出的分析框架不足以解釋那些為貿易、運輸以及鞏固殖民勢力等目的而建立的非掠奪性殖民地的經驗 (Shoemaker 2015)。

其二，這套文獻忽視殖民治理中的地緣政治因素及殖民者所面對的外部挑戰。政治地理學者 John Agnew 說，國家不先於國際關係而存在，「國家資格」(statehood) 的形成，往往是對內的國家營建與對外的鬥爭的結果，國家的內政與外務實互為相關，彼此不能區分；國家推動的內政，有時是受外在因素促使；相反，外交政策的方向和執行的條件，也繫於內政的需要和內在條件是否允許 (2005: 440)。一如其他正常國家，殖民地也不隔絕於外在的國際政治格局。殖民者相對於被殖民者的權力以及他們的治理手法，也會受制於外在的地緣政治因素。

這套文獻另一顯著的缺陷，是它對殖民統治領土維度關注的不足。例如，Harris (2004) 受法國後殖民理論家法農 (Frantz Fanon) 的啟發，探討了「力量線」(lines of force) 如何影響殖民地的地理佈局。然而，他的分析缺乏政治地理學領域中關於國家領土的理论支撐，因而顯得單薄。Frederiksen (2014)、Hannah (2000) 和 Duncan (2007) 等嘗試從地理學視角出發，探討殖民經驗的「現實性和物質性」(actuality and materiality of colonial experience)，並確認了殖民治理術施展上存在的空間差異，即不同的殖民地有不同的條件，殖民者的治理術也要因地制宜，在不同殖民地採用不同方案。然而，他們的研究所關注的主要是殖民者賴以對殖民地作經濟剝削的人口治理制度和資本主義生產體系的建立和運作，而忽視了殖民國家如何「生產」(produce) 其佔有的領土，以鞏固其統治的努力和過程。

香港地域狹小，英國在此開始殖民統治，非為掠奪其人力、土地及農業資源，而是以香港為據點拓展對華貿易，並為它在東亞區域的商業和航運網絡作佈局。因此對英國而言，香港的最大價值是其法律體系、

市場機制、資訊網絡，以及聯通區域內外不同貿易據點的交通和通訊基建。1898年英國向清廷租借新界，更非為掠奪其資源，而是以其縱深，屏衛港九市區。如此，香港、九龍固然屬英國統治下的非掠奪性殖民管治，英國人租借新界之初也無意圖在此掠奪資源，因此它並未在新界推動農業發展和大型建設。一如在其他地方，英國在香港殖民時期也實行間接統治 (indirect rule)，然而它在新界所建立的間接統治體制，卻是弱勢，這或與新界非掠奪性殖民管治的本質有關。這方面我將在第四章詳細論及。

二次大戰後，世界進入美蘇兩大陣營對抗的冷戰時代。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外交上採親蘇路線，香港地緣政治處境惡化，為中英兩國、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陣營所爭奪。面對如此敏感的地緣政治局面，港英政府要在新界建設大型的供水系統，開墾水資源以供港九之所需，實非易事。以下介紹的政治地理學的地緣政治、供水政治及領土治理三套文獻，能為我們探討香港殖民政府如何以其原有的弱勢間接統治體制，在冷戰時期緊張的地緣政治局面中營建它在新界的領土，提供有用的理論視野。

## 政治地理學的理論視野

### 地緣政治理論

經過二次大戰後幾十年的沉寂，地緣政治問題近年又成為政治地理學的一個熱門話題 (Taylor and Flint 2000: 49–50)。地緣政治分析是政治地理學思考國際政治問題的重要一支。國際政治分析有兩大傳統：現實主義 (realism) 和為理想主義 (idealism)，而地緣政治分析乃屬現實政治的傳統 (Painter 2008: 58)。地緣政治分析側重國與國、甚至是國家陣營之間的對抗關係，因此，它所秉持的是一套權力政治觀 (Taylor and Flint 2000: 52–64)。地緣政治思考，早期最具影響力的是英國理論家 Halford

Mackinder的「心臟地帶理論」(heartland theory)。心臟地帶理論於20世紀初開始形成，它強調領土佔有多少與國家政治力量強弱之間的直接關係(Painter 2008: 58)。Mackinder因而指出英國在國際的競爭形勢中，要致力對歐亞大陸這片世界政治格局中的心臟地帶的人口和資源有充分控制，以防被敵對的德國、蘇聯染指。Mackinder曾這麼說過：「誰統治東歐，便掌握了心臟地帶；誰統治了心臟地帶，便掌控了世界島(即亞、歐、非洲大陸)；誰統治了世界島，便控制全世界。」(1919: 194, in Cox et al. 2008: 7)

除了Mackinder，還有德國納粹傳統的地緣政治觀。納粹傳統的地緣政治觀是納粹德國向外侵略背後的理論依據，其重要論者包括Karl Haushofer。他提出德國當時所面臨的困局，乃源於一次大戰後凡爾賽條約對其國土範圍的不公平限制，他主張推翻凡爾賽條約，讓德國擴充其「生活空間」(“living space” / *Lebensraum*)，消解其困境。Haushofer言及的德國生活空間，不單指東歐，還指大戰後它喪失的海外殖民地，因此它有著全球性的定位。納粹地緣政治觀把世界劃為三大「泛區域」(pan-regions)，分別以德國、日本和美國為中心建立起來，每個泛區域內部都形成核心與邊陲的體系。因此，它斷言世界終將形成三個相互區隔的世界體系(Taylor and Flint 2000: 56-58)。

二戰後，美國成為支配世界的強權。美國的地緣政治觀不同於納粹德國的一套。納粹德國的戰略盤算重大陸而輕海洋。戰後美國的對手蘇聯，盤踞著Mackinder所言心臟地帶中的歐亞大陸，以Nicholas Spykman為首的美國地緣政治論者則提出了「心臟地帶－邊緣地帶論」(heartland-rimland thesis)，為美國的全球戰略佈局提供了基礎的理論框架。心臟地帶－邊緣地帶論認為，戰後的世界局勢由以蘇聯為首的大陸強權和以美國為首的海洋強權所主導，介乎兩大體系之間的就是「邊緣地帶」。對美國而言，邊緣地帶就是可用以圍堵蘇聯的空間佈局，以防整個世界島都落入後者的控制。美國在冷戰時期推動的「圍堵」政策(containment)，是把「心臟地帶－邊緣地帶論」付諸實行的具體政策(Gerace 2007)。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1950年韓戰爆發，1951

年杜魯門總統的印度太平洋事務顧問杜勒斯 (John Foster Dulles) 提出美國要以其在西太平洋的海軍基地投放軍事力量，圍堵蘇聯和新中國。「島鏈」(包括第一、第二及第三島鏈) 的概念由是而生。冷戰時期美蘇對抗的重心在歐洲，因此「島鏈」戰略並未成為冷戰時期美國的戰略主軸。然而，因「島鏈」戰略的落實，西方的海洋強權形成了對以中蘇為首的陸地強權的圍堵。同時，美國亦相繼建立歐洲的北大西洋公約組織、中東的中央公約組織及東南亞的東南亞公約組織，以與其盟友有效協同，聯手對抗蘇聯陣營 (Gaddis 1981; Taylor and Flint 2000: 58–60)。香港不屬於冷戰時美國營建的第一島鏈，但因它位處中國的南端，是更靠近中國內地的所在，因此美國一直以之收集新中國情報，它設在香港的總領事館更是韓戰時負責對華禁運令的重要機構 (Fu 2023)。

為對「心臟地帶—邊緣地帶論」的不足作補充，Saul Cohen 提出了「破碎地帶」(shatterbelts) 理論。Cohen 並不否定 Spykman 的圍堵蘇聯戰略，但他指出邊緣地帶有可能會落入蘇聯的掌握，而導致圍堵戰略失效。所謂「破碎地帶」，就是美國不能有效主導的邊緣地帶，包括中東、東南亞和非洲。在破碎地帶中，美蘇都有其據點，彼此在當中角力，以求主導該地帶，雙方勢均力敵。Cohen 因此認為，圍堵戰略要有效，圍堵網的建立應按輕重緩急有序推進，其重點是在「破碎地帶」(Taylor and Flint 2000: 60–61)。

西方的一些觀點以外，中國在幾千年的歷史裏也發展出其地緣政治觀。人們耳熟能詳的一些詞匯，包括「遠交近攻」、「合縱連橫」、「以夷制夷」、「以藩為屏」等，都是中國古時的一些地緣政治方面的想法。傳統上中國的地緣政治觀有兩個最基本的特點：一、中國中心論，即中國是天下之中心，是「中心之國」。在這套思維影響下，歷朝統治者不了解以至不願了解外部世界，而選擇以閉關自守為國策。二、重陸輕海的地緣政治觀。中華文明是植根於土地的農業文明，它發端於北方，然後向南開拓出大片土地，造就了繁榮的農耕經濟，因此以農立國的思想也牢牢建立起來。它面對的外敵主要是塞外的遊牧民族，戰爭也主要是陸戰。海洋對中國而言是屏障，也是國界所在，面對海洋，它只取其「漁

鹽之利」，它的造船和航海技術在明朝鄭和下西洋後就沒落，其後面對來自海洋的挑戰時，它便採海禁、閉關鎖國政策。再其後，西方工業國家從海洋而來，以其堅船利炮敲開中國國門，中國由古時便建立起的以藩為屏的體系也告崩潰（樓耀亮 2002: 77-89）。

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適值美蘇兩大陣營對抗之冷戰時期，其時西方陣營對中國採取「政治上孤立、軍事上壓制、經濟上封鎖」的策略，中國於是向蘇聯「一邊倒」，兩國簽訂《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為應對西方對中國實施的封鎖，毛澤東更從陸地與海洋的角度思考中國的未來。1949年建國在即，他對斯大林的特使講到中國局勢和未來走向時指出：「海島上的事情就比較複雜，須要採取另一種較為靈活的方式去解決，或者採用和平過渡的方式……。在這種情況下急於解決香港、澳門的問題，也就沒有多大的意義了。相反，恐怕利用兩地的原來地位，特別是香港，對我們發展海外關係、進出口貿易更為有利些。」換言之，毛是以西方陣營海洋封鎖中國最薄弱之處——香港，來突破西方對中國的封鎖。1951年，周恩來通過廖承志向香港新華社傳達中央的指示：「我們對香港的政策是東西方鬥爭全局的戰略部署的一部分。不收回香港，維持其資本主義英國佔領不變，是不能用狹隘的領土主權原則來衡量的，來做決定的。我們在解放全國之前已決定不去解放香港，在長期的全球戰略上講，不是軟弱，不是妥協，而是一個更積極努力的進攻和鬥爭。」（強世功 2008: 81-83）1950年代末中蘇交惡，中國政府更倚重香港作為對外溝通的窗口，因此制訂出「長期打算、充分利用」的對港政策。顯然，香港在中國共產黨和新中國政府的地緣政治理論中，有重要的角色。

及至1950年代以後，中蘇兩國間矛盾漸生繼而鬧翻，社會主義陣營分裂，毛澤東提出「三個世界」論，把不同國家劃分為第一（美、蘇）、第二（歐、日、加拿大）和第三世界（包括中國在內的亞、非、拉各國），它們之間互相聯繫又互相矛盾，此後中國的地緣政治戰略不再以意識形態、政治制度劃分敵友。其後中美和解，鄧小平的「東西南北」理論提出「和平問題是東西問題，發展問題是南北問題」，認為和平與發展是